

周揚文集



周揚文集

周揚文集



责任编辑：白烨 松涛 罗君策

周扬文集（第四卷）

Zhou Yang Wen 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8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 插页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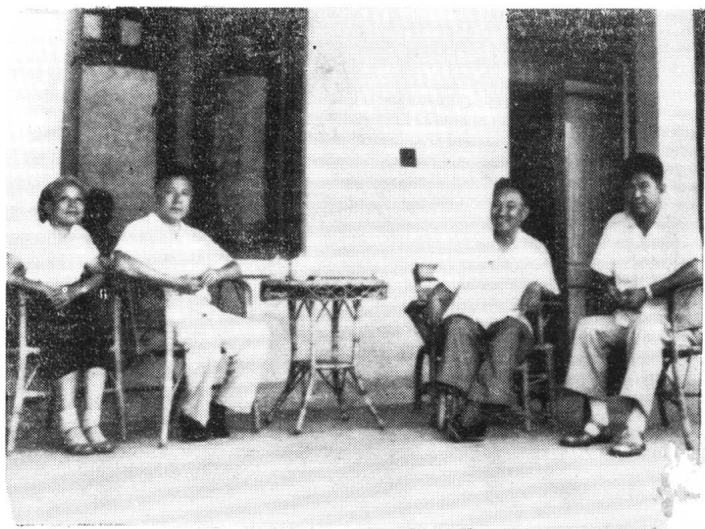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1292-2/Z·46 定价 5.90 元



作者像（一九七八年）

六十年代初在天津
会见远千里



一九七八年周扬、
张光年在华北油田

出版说明

从三十年代初到现在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革命家和文艺理论家，作为革命文艺运动和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之一的周扬同志，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以及在理论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很多论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了总结革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编辑出版《周扬文集》是十分必要而又具有迫切意义的。

选入本文集的文章，编排以年代为序，共分五卷：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为第一卷；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六年的为第二、三、四卷；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为第五卷。

本文集所收文章，为保留历史原貌，原则上不作改动。凡出过集子或单行本的，文字以集子和单行本为准；凡发表过而未收集子的，文字以发表时的为准；凡未公开发表过的，文字以内部文件为准，或由当时的记录稿整理而成。

有些文章，在今天看来，存在政治性或政策性的问题，由作者在文后加附记，说明文章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在的看法，借以总结经验教训。这种附记，有的加之于单篇文章，有的置诸同类型文章的首篇。凡学术性的论争，则不加说明。

一九七八年以后发表的个别文章，作者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精神，作了适当的改动。

编辑过程中，除对文字的错漏繁衍，加以订正外，对文章的引文，一般不校不改。

文中的外国人名、地名、书刊名的翻译，均保留原貌。凡不合通行译法、不注释便会影晌理解文意，甚至容易发生误会的，则简要注明通译名。凡没有翻译的外文，在注释中注出译文。

参加本文集编选注释小组的有：马良春、张大明、李葆琰、罗君策、郝怀明、谭小邢(以姓氏笔划为序)。文集编选过程中，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些同志曾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特在此对上述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四年三月

目 次

一九六一年(下)

在文科教材外文组汇报会上的发言	1
在解决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10
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4
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	35
对《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的讲话	67
关于《教育学》编写工作的谈话	72
在河北省作家艺术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91
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98

一九六二年

与在京部分老剧作家的谈话	116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编写会议上的讲话	124
在文科教材政治、哲学组汇报会上的讲话	135
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 意见的报告	142
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150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二十周年

在长春观看吉剧演出后与主要演员的谈话	159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讲话	162
在长春市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	167
在长春电影、话剧演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77
在沈阳与文艺界同志的谈话	186
在旅大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97
在大连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
关于“百家争鸣”与知识分子政策	209
在《欧洲文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214
关于学术研究与出版问题	22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	227
《国际歌》——号召全世界人民革命的号角	241

一九六三年

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漫谈	245
关于农村文化工作的讲话	266
在全国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78
在故事片厂厂长、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286
看了《李秀成》后与演员们的谈话	292
在戏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96
关于当前文艺工作中一些问题的意见	320

一九六四年

文学创作应该写知识分子	349
在河北省各地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	353

一九六五年

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文化艺术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	363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会见油画工作者时的讲话	374
在培养青年文学创作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378
在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上的报告	384

一九六一年(下)

在文科教材外文组汇报 会上的发言*

我们的目的是影响人,影响青年,但培养怎样的青年人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头脑简单,知识贫乏,感情简单,生活简单,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另一种是头脑很复杂,知识很丰富的青年,他们在丰富的知识和丰富的感情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究竟那一种好?第一种简单省事,但靠不住。社会主义的人应该比资本主义的人更聪明,更有知识。

大学生应该普遍地学外语,专门搞外文的人,对那个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都应该有比较多的了解。如果只会讲中国式的日语、英语,肯定是不行的。

我希望我们编选的教材有一点评论,通过这些评论表明我们的看法,对学生的学习予以引导。

这几年,语言课本注意政治思想内容,这是好的,对的。但发展到把语言课本变成了政治课本,这就不对了。语言课的确是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课程,但主要的目的是教授语文,训练阅读、欣赏、学会运用。这是直接的目的,这个目的不达到,哪里还

* 这是作者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的讲话,未公开发表过。

有政治第一？我们需要熟练的外文干部，使他们用外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头一条政治利益，政治要求。如果政治好，外文却不好，就很难说完成了政治任务。不要把教育的政治标准理解为在所有的课文中讲政治。

教材的编选当然要坚持政治标准，但对古人与今人应有不同的要求。对于今人，要看他的政治态度。凡赞成社会主义的，或者不反对社会主义的，只要他对人民有益处，无害处，那就应用艺术标准去衡量选不选。这也就是说在不反对社会主义、不反对人民的范围内，艺术的标准第一。对古人就不能这样要求，不要首先着眼他们政治上是进步还是反动，而主要看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于今天有没有益处。至于他的政治态度，那已属于历史，对我们不发生什么影响。苏东坡反对王安石，这个政治问题和我们无大关系。一般人都记不得苏东坡是保守派，但都记得他的那些作品。对古代作家的政治要求，主要看对人民有害处还是有好处，主要看他的作品。在古代文学史的编写中，当然可以分析他的世界观，至于教材中选不选，主要看作品的价值。如果情调不那么健康，多少有点害，但艺术性很好，有相当大的影响，恐怕也还需要选一点。多了也不好，没有也不好。没有就不知道文学史的全貌，不知文学中有这么一种东西，这是损失。选了也可能有坏影响，可能使青年着迷，受害，因此，不能多选，而且要在前言中加以说明。对这样的一些作家作品，选文章的人要斟酌。例如李后主的词，就属于这一类。

不能用我们现在的“道”去要求古人，只能用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的道去要求他们。看在那个时期，他是否顺应历史，是否起过进步作用。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有进步作用，也有局限性，我也是提倡批判的，但有的地方走了极端。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但

批判并不等于抹煞人道主义，它在历史发展上确实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在过去，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很好的思想了。如果这些东西都不能容许，不能选，那教材就无法编选，这也是反历史主义的。

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当然可以选。既然要选，当然大部分应该是进步的。连批判现实主义都不选，那么还选什么？

批判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不是简单的对立，有继承的关系，也有朋友关系。光讲对立，不完全。这两个阶级的文学是对立的，但又有统一的方面。许多无产阶级文学家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在共同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问题上，可以说是做了朋友。二者的世界观不同，理想不同，方法有一部分相同，比如在现实主义某些问题上。无产阶级文学家有理想，要革命。这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不同的。

所以，不要把政治标准看成死东西。对古人、今人、对党员、对朋友的要求应该有所不同。合乎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政治标准。政治标准第一，不是政治口号第一，不是政治概念第一。什么都想搞个框子，以今求古，把框子搞小，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史》受我们某些报告的影响，用反人道主义、反和平主义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古代文学。第一版本来是比较“左”的，第二版肯定了一点古人。文代会后，又想改得比第一版还“左”。我劝他们不要这样做。我们的报告是针对目前的国际政治斗争而言，怎么能以此去套历史呢？

对今人，要求他不反对社会主义，即用“六条”去看。对古人，则不能用“六条”。对古人用三条：有益、无害、有害，都是指他们对人民的态度。至于艺术，恐怕都是好的，不好的是不会流传下来的。

过去，我们提出批判是反迷信。其实，我们都是十九世纪民主思想培养出来的。十九世纪许多富有民主思想的文学家在我们脑子里的威信等于过去的孔夫子。我主张破一破迷信，而不是要否定他们的成就，我们仍然需要继承，包括斯汤达尔、罗曼·罗兰。资产阶级文学到十九世纪末就衰落了，出现了颓废主义倾向，显出了世纪末的没落味道。但无产阶级文学在成长过程中，可以看到对颓废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都有吸收，这是它的弱点。它不能越过它们，也要受点影响。中国的创造社就受到颓废派的影响。文学研究会受自然主义影响。在继承过去的文学时，这一段割不掉。后来他们都变成无产阶级文学，成长起来了，才把这些割掉。颓废派也对社会不满，一个人绝望以后可以走两条路，一条是革命，一条是自杀。欧洲的唯美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的很多。事物要历史地去看，不要以为无产阶级文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概念化的政治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了。简单化的教育可以收一时的效果，但从长远看来是有害的。

政治标准第一主要是看对青年有益还是有害，其次要看业务上能否满足要求。并不要每一篇课文都反映政治，这种文章要有，但不能过多。它们还未经考验，不能都算范文。范文不是一下子出得来的。我们两千多年的文化，才挑了两本《古文观止》。其实，苏东坡写的东西也比挑中的多。可见范文是不多的。所谓范文，就是要有某种典范性，有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

我要求同志们不要有顾虑，要注意语言标准。对莎士比亚，更不要顾虑，选《威尼斯商人》会不会对犹太人不好？这你们用不着担心，犹太人自己也愿意读的。至于凯撒，他和曹操差不多，有争论也不要紧。

如果这样去看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顾虑会少一些吧？现在

青年人有顾虑，老年人有顾虑，党内、党外都有。这几年斗争多，产生一种效果，有的人怕犯错误，有的人怕搞不出好的东西。这也有好的一面，不完全是消极的，有责任心，对人民的政治责任心。

不要把青年搞得头脑过于简单。我们的学生过去只注意外国、古代，不注意今天、中国，这几年，主要解决了这个问题。要注意中国，注意今天。为了今天，为了明天，为了中国，要了解昨天和外国。中国经济文化落后，怎么改善？就要学，向古人学、向外国学，学古文、学外文，甚至这也为了改善明天。当然，主要是向群众学习。但只学今，不学古，也不学外，就搞不好。要了解中国，首先在中国了解，但跑到外国去也可以帮助了解中国，而且很必要。可以比较比较，与古代比较，与外国比较。相比之下，青年人会不会感到还是古代好、外国好？要讲清楚，古代、外国也许很好，但比我们差得远。不要把学生想得那么差，见了黄油面包就被吸引了。很多人吃过这些东西，现在吃不上，这是靠政治觉悟支持他，不是靠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东西来支持他。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不是不知道有好的生活。乐观主义不是不知道困难和牺牲，他能经历各种挫折，而仍然是乐观的。我们今天艰苦奋斗，就是为了建设自己的美好的生活。学生是能够理解这些的。我们也要这样教育他们。

学外文的人，要了解人家的生活方式、民族特点，他们的习惯、心理、传统。了解得越细越深越好。你们大胆一点，不要紧的。这不是右。

文学史的问题，冯至同志讲了，我没有多大意见。文学发展有一个过程，要叙述这个过程。流派的斗争有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但比政治斗争更为复杂，千万不能理解为象我们和右派的斗

争那样，壁垒那么鲜明，对立那么尖锐。不要用现在的党性原则去描述，要注意历史事实。

在文学史中搞一个导引式的概论是可以的，但不要搞标签主义，不要用今天高度发展的斗争形式去要求古人。要有客观过程的描述。讲讲他矛盾的过程，有人是先进步，后反动。有人先反动，后进步。要介绍过程，两面都介绍，不要只有一面。作家作品放进概论不完全合适。文学史由作家作品构成，不是先有流派，后有作品，而是先有作家作品，然后才有流派。现在说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怎么结合？有人希望规定几条。其实，作家不必管这个事，你去写出来了，别人再来研究，不是先有几条，再按着几条去写。没有根据条条去写作的作家。黑格尔说，逻辑研究思维的规律，但没有人是按照逻辑的几条规律去思维的。理论总结创作经验，并非照着理论去写作。生理学研究人吃东西的过程，但没有人照生理学吃东西。

不写史，只写作家，变成列传，就不是史了。但重点作家重点作品应详细介绍，这是合理的，有影响的作家多写几笔。

字数不要太限制。你有材料，写得好，多写一点也没有关系。一般说，我偏向精炼一点。

你们奋斗一下，搞几本文学史出来看看，现在我们没有这类书，所以，很希望同志们写出来。

既我们面对的是遗产，当然主要的还是继承，但必须是批判地继承。去年提倡批判，因为感到十九世纪的东西在青年中影响很大，要破一破迷信。去年全国反修正主义，对遗产批得过分了一点。

对于古人，只能要求他有没有说过前人没说的东西。不是要求他说后人说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也都没有说过人民公社